



南国政治学人文库

THE ROAD TO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韩和元◎著

通往正确之路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文库

THE ROAD TO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韩和元◎著

通往正确之路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通往正确之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韩和元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5

ISBN 978-7-5620-7529-5

I. ①通… II. ①韩…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172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586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 编辑邮箱 zhengfadch@126.com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 印 张 9.875
- 字 数 240 千字
-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9.00 元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广东公共管理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高水平学科建设基金
草根学术部落斯为盛学社学术成长基金

《南国政治学人文库》 学术委员会

常保国（中国政法大学）

陈 潭（广州大学）

董江爱（山西大学）

郭忠华（中山大学）

洪永泰（台湾大学）

孔繁斌（南京大学）

米加宁（哈尔滨工业大学）

彭 勃（上海交通大学）

吴 毅（华中科技大学）

肖 滨（中山大学）

严 强（南京大学）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

朱仁显（厦门大学）

陈振明（厦门大学）

丁 煌（武汉大学）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黄百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马德普（天津师范大学）

倪世雄（复旦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

徐湘林（北京大学）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

周敏凯（同济大学）

《南国政治学人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陈 潭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黄 金	胡 晓	蒋红军	匡凯平	雷石山
李小军	李 坦	刘建义	刘显利	刘兴云
刘 波	刘 杰	罗晓俊	倪明胜	彭东琳
彭铭刚	沈本秋	史海威	石小娇	孙岳兵
王 霞	伍小乐	熊美娟	于 勇	朱国伟

总 序

以丛书和文库的形式系统、集中地展示人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加以研究所获取的成果与知识，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积极筹划和大力推进的旨在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有效方式。《南国政治学人文库》宗旨就是要努力构筑一个平台，在其上让年轻的政治学人们客观、真实地记录和描述当代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变革，科学、公正地探索和阐释这种历史变迁和现实变革过程的因果联系与内在规律。

在当今中国，存在两个不争的事实，支持和呼唤着科学的政治学研究。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经济变革、经济发展顺利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唱主角的；而当经济变革、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仅仅靠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不行了，需要的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及其生产者，尤其是政治学和政治学家。第二个不争的事实是，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造成的庸俗政治曾一度使得正直的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学厌恶、冷漠的时期已经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滞后的政治改革才是经济改革不易深化的重要原因，任何有志于对中国总体社会变革作出客观、科学的解释、设计和预测的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政治领域、政治生活才是他们需要特别关注和研究的方面。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出现了，研究政治和政治学的兴趣明显增强了，政治学有望再度成为显学。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也只有政治才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总体社会变革、开放、转型、复兴的钥匙。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伟大的总体社会变革，都是由政治领域、政治生活的变革为先导，又是以政治领域、政治生活的创新发展为后盾的。中国总体社会的改革、开放、转型和复兴也不例外。

虽然经济学家们特别看重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革新在中国总体社会改革、开放、转型和复兴中的基础作用，但是，不充分估计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政治领域发生的变革，以及这一变革对经济领域变革的先导作用，就无法对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的发生作出客观科学的解释。因为没有对“文革”政治的断然否定，没有对阶级斗争政治的决然摒弃，以实践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大解放就不会出现，后续的经济领域、经济生活的改革、开放也不会出现。

虽然经济学家们喜欢从经济领域、经济生活中寻找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动力，甚至有的人试图将政治变革撇在一旁，谈所谓的纯经济改革，但是，不充分估计当代政治中民主和法治的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影响，看不到正是政治领域、政治生活变革的迟缓成为全面制度建设中的短板，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总体社会五位一体的协调推进，就无法正确地设计和确立持续深化改革的战略。因为政治生活嵌入在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之中，政治说到底不仅影响着资源的配置，还决定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权威性分配。总体社会的改革、开放、转型和复兴，最终都避不开、绕不了彻底、真实的政治领域、政治生活的变革。

看不清政治生活在总体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懂得甚至轻视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固然是一种欠缺，但是，仅仅重视政治的效能和政治学研究的作用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

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在这知识领域中只有善于研究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有不少政治学家已经讲述过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但我认为，在这些众多的方法、技巧和途径中，关键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有两条。

一条就是研究政治学要服务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要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努力创造出让民众能够知晓、喜闻乐见并加以利用的政治学知识。因为在政治领域中活动的是成千上万的有着不同政治权益和政治诉求的公众，政治过程的因果联系和内在规律并不是哪个有权势的人事先规定的，而是如恩格斯所比喻的，是无数分力按照平行四边形的法则汇集起来的合力。所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只有普通的人民和民众才是政治生活的主人和创造者。要科学地理解政治，将政治学变成科学，就要把政治学变成能够被多数人，特别是普通民众所理解、所运用的科学。政治学曾经是少数人垄断的知识门类。政治学要获得发展，既需要将其从少数政治精英的手中解放出来，也需要将其从教条式的、学究式的政治学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普通民众手中的知识武器。

另一条是政治学研究要服务于中国政治的变革与发展。有些政治学研究者误把西方的政治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强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要套用和服从西方的标准、概念和原理。有些政治学的研究者则片面夸大中国政治的独特性，强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要坚决拒绝和排斥任何西方的东西。站在这两个极端上是断然无法对中国政治学作出科学的阐释、概括和预测的。中国的政治是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具体政治，坚持联系中国政治的具体实践，梳理中国政治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变革，阐释中国政治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概括中国政治运行、

变迁和发展的规律，由此产生的政治学知识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它既能为人类政治学知识的增长与完善贡献力量，又能为中国政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的支撑。

政治学研究不仅是一项充满理性的、理智的事业，还是一项富有艺术性的事业。著名政治学家霍布斯一方面将人看作有理性的、“大自然”最精美的艺术品，同时又进一步将国家看作人运用艺术才能创造出来的一个精致的艺术品。人只有和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生活打交道，才能逐步学到精致的艺术。与霍布斯持相同见解的政治学家詹姆斯·哈林顿也指出：“根据法律或古代经纶之道来给政府下定义时，它便是一种艺术。通过这种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的权利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则从更高的层面强调政治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比如列宁就明确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

现代政治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在政治设施、机构的设计和建构上，还表现在政治生活的治理上。人类曾经长时期处在对抗争斗的政治、暴力统治的政治、随心所欲的人治政治之下。这种残酷无情的低级政治正在离我们而去，虽然某些政治制度、少数的政治精英还在思维和行动上对其留恋不舍，其残余的力量还会顽固地产生作用，但是，和平、变革与发展的政治，互通、协商与和谐的政治已经成为人类期望和追求的目标。暴力政治、统治政治需要的是对权力的支配和掌控，和谐政治、协商政治需要的则是艺术性的治理。

由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构成的现代政治生活大厦是要靠人依据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来设计、治理的。政治设计需要艺术性，政治治理需要艺术性，政治学研究必须具有艺术性。这

种政治学研究的艺术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尽量展现现代政治生活的艺术性特征，包括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设计、建构和运行的艺术性，国家治理的艺术性；二是要尽量艺术性地设计政治学研究的过程、方法，艺术性地展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与知识。

《南国政治学人文库》是青年政治学人共同的政治学术家园。这里将聚集一批充满活力、没有多少教条束缚、敢于创新的政治学的研究者。这也是一片沃土，许多关于现代政治生活的设计、建构运行和治理的真知灼见会像幼苗一样从这里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这一学术家园，这片沃土，只要好好照料，定会收获一批批丰硕的果实。

严 强

（南京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2016年春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PREFACE | 前言

就本书而言，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所表明的，这是一部有关经济学的著作，为何被纳入《南国政治学人文库》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所预备做的回答是：于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眼里，经济学从业者似乎观点林立，涉及领域众多，但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但也正如供给学派的旗手阿瑟·拉弗所指出的，经济学只有被应用于实践中才会有意义。而且，经济学一旦被政府所运用时，它总会带有政治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学观点最终都将还是政治的。何况本书所探讨的内容更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这本书纳入政治学人文库的范畴也就没有什么不妥的了。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努力地将探讨的领域限定于经济学和通过政治进程对基础经济学的运用上。

就当下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无疑也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书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就这个问题，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指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他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归根到底这些工具

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1〕德国战后奇迹的缔造者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亦曾指出，他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就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此来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他所坚持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成果〔2〕，“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有走向繁荣的可能”〔3〕，以实现以共同富裕（Wohlstand für Alle）为主要形式的大众福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是地区，之所以要谋求社会经济之发展，其根本目的不单纯是要求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幅，不单纯是要求其财富的增长，不单纯是要求其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单纯是要求其社会现代化……而应是旨在为其人民谋求一种以共同富裕为基础、以实质自由增进为重要形式的大众福利，应是旨在于让绝大多数的人民都能够过上更为美好、幸福的生活。

但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仅仅只需要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更需要发展生产力〔4〕。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生产力不取得发展，财富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财富供大家分配。只有生产得到发展，社会才可能得到相应的国民收入，这时才有条件来谈分配。这就如同一个家庭只有有了一块足够

〔1〕〔印度〕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2〕〔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3〕〔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大的蛋糕，才能保证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分得更大一份；如果那个蛋糕本身就很很小，那么无论你的分配是多么地公平、多么地公正，也不能使每一个家庭成员因此而能够多分一点。这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可见，发展的目的固然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显然不是简单地依靠收入分配来实现的，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经济的增长，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分配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是说，要想有蛋糕可分，那么就必须确保经济得以增长，且是可持续地增长。本书的目的在于寻找那些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以此来保障我们的蛋糕得以可持续地做下去。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似乎已无可非议了。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会在真正意义上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或者如艾哈德所说的，哪种制度才是效率最高的制度呢？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虽然观点纷呈，但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一种观点认为，剥夺人们所应获得的某些权利和自由即专制，将更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在阿玛蒂亚·森看来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被视为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以上两种观点只是提出了初步的理论论断，二者之间的矛盾与竞争，由于均缺乏完备的逻辑体系支撑，而令人无法确信，在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关联。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试图通过经验来打破这种理论的僵局。利普塞特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情况相连。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

大。”^{〔1〕}他认为：“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一个社会一边是大批贫穷的群众，一边是少数受到优待的精英，结果如不是寡头统治（少数上层的独裁）便是专制（有群众基础的独裁）。”也就是说，利普塞特更为强调于中产阶级这一内生要素。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肯尼思·博伦（Kenneth A. Bollen）、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人，尤其是亨廷顿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全球三波民主潮的观察，亨廷顿与利普塞特、博伦的分析几乎一致：“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2〕}他甚至公开指出，“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3〕}。

这些观点也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教授的支持。基于对138国跨度30年的经验数据的研究，巴罗认为：“民主和繁荣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成为一条确凿的经验规律了”^{〔4〕}，这种规律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对应的民主程度也会相应地更高。在此基础上，巴罗进一步总结道：虽然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能够通过美好的愿望而建立起民主这一政治体制，但因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持，这些国家通常无法将这种政治体制维持下去。当然，也正是基于

〔1〕〔美〕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3页。

〔2〕〔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9页。

〔3〕〔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0页。

〔4〕〔美〕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那项跨国研究，巴罗也承认“更多的政治自由（民主）对增长的净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1〕}，“在民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随民主而上升，但是一旦达到适度的政治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成负”^{〔2〕}，“民主对于投资率的影响类似于非线性关系”。^{〔3〕}为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已经获得了适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就会遏止增长。”^{〔4〕}由此可见，是经济增长在促进民主而不是民主在促进经济增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经济的增长呢？通过对成功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今昔、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无论具体的政策差异，在两个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①都是非民主的威权统治国家；②都在威权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下，在国内和地区内确立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私有企业是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私人产权也能得到政府的足够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里，除了政治事务以外，在诸如社会、经济事务领域中，民众拥有相当程度上的自由。这一现象正是遵从前述规律的产物，而这正是推动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中国的现状呢？在本书中，我们沿用了上述学者的方法，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民主程度予以考察，所得的结

〔1〕〔美〕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2〕〔美〕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3〕〔美〕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4〕〔美〕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论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而言还很低，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还很小。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数据是，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仅为 20.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尚有 78.9% 的成年人口的财富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最低标准”^{〔1〕}，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尚不足以为民主化提供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当然，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民主发展程度又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程度。根据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强正相关性定律可见，我们虽然缺乏推进民主的经济基础，但却仍然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巴罗也曾指出：“当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时候，更多的民主会促进增长。”^{〔2〕}综此，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进行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是确保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通往未来的正确之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进行这场经济自由化改革呢？我们认为，这场改革将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哈耶克（1899~1992 年）认为，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的态势的过程。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活动的私域，并使其相应地拥有经济自由。经济自由表明的是一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其他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的影响，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开展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也就

〔1〕 甘犁：“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超过两亿 财富超美国跃居全球首位”，载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jr/201511/t20151117_4842956.html，2015 年 11 月 17 日访问。

〔2〕 [美] 罗伯特·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 页。